

水泥與糞便：開展湘西小溪鄉 「生態扶貧」論述的能動機緣

石之瑜

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）

摘 要

湘西生態扶貧論述給村民提供了某種發展主體能動意識的機緣。生態是一種具有在地性的論述，在地村民站在生態的基礎上，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，有所自信地形成一套看法，具備不同於國家的視角，對國家政策提出不同看法，說明生態意識不是國家幹部能夠片面封鎖的一套動員工具，而是備受競爭的一個觀念場域。國家在生態論述中發展出來的遷村政策，反而是與生態論述不全一致的產物。固然在表面上，為了保護生態而遷徙，似乎是對生態的尊重，但深層裡卻因為牴觸了村民對自己在生態中的定位，造成村民主體意識中所萌生的某種抗拒力量。恰巧由於遷村的執行遲緩，意外凸出了村民的生態保護與國家的生態保護重點不同，畢竟村民不會相信自己世代居住的原始森林，要因為自己繼續生活在此而遭破壞。而為了脫貧，他們之中便有人積極擴建，以吸納更多的遊客，忤逆了封山政策，也就將小溪鄉的主體性反襯出來。生態扶貧的概念讓他們超越貧困村的自我理解，則他們的抗爭就不是單純的反抗國家政策，因為他的主體性不全來自國家，而更奠基在他們熟悉的、融入的、且國家已經認可的他們世代生活的環境上。

關鍵詞：生態保育、扶貧、湘西、能動性、現代化

* * *

一、生態扶貧政策的提出

生態扶貧概念的提出，同時著眼於生態的維護與恢復，以及當地居民創收能力的提升，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政策中被凸出一個特色。中國大陸扶貧的工作從二十一世紀起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，湖南省扶貧工作人員在總結過去若干經驗之後發現，由扶貧單位以派駐幹部、挹注資金與開發項目的方式介入貧困村之後，固然可以產生一時的效果，但扶貧單位離村之後的發展甚不穩定，貧困村面對自然災

害的能力很脆弱，管理生產項目的技術欠缺，各地返貧的現象時有所聞。簡言之，以改造貧困村生產文化，重建貧困村幹部素質的扶貧措施，未必能產生長遠的扶貧效果。基於這個經驗，扶貧政策的思路開始出現轉變。從貧困村立基的自然人文條件出發，找尋符合當地條件的脫貧途徑，就比由外而內介入的上述替代開發模式，受到更大的關注，而生態扶貧的提出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。

生態扶貧在一定程度上撞擊了過去的貧窮觀。中共官方所理解的貧窮，慣常是以「人均收入」為最根本的依據，雖然在實踐上，具體的貧困線是劃分在哪一個數字上，往往從中央到鄉鎮各有說法，但總不脫貨幣收入的範疇。不過，在扶貧幹部的實際體驗中，貧窮的概念卻逐步變得內涵豐富。最初，湘西的扶貧千篇一律是從解決水、電、路等基本生活條件著手，這方面的成績大過於對貧困村創收能力培養的效果。接著，扶貧單位對貧窮原因的分析逐漸取代了貨幣收入，以致貧窮原因與貧窮的定義之間區分不清，故謂貧困之發生是因為愚昧，或所謂文化上的貧窮，然而以扶貧單位之力，不可能進行文化改造。同時，貧困村對扶貧單位感恩戴德，依賴性甚為明確，沒有形成主體能動意識，這是生態扶貧得以切入的關鍵。

生態扶貧一改過去以效益收入為優先的扶貧思路，而將之在觀念上置於其次，轉而強調湘西生態資源的豐富。過去用於開發山林以致富的模式被推翻，立即資源不再用於開發，而用於維護生態資源。則過去貧窮被視為一種未開發狀態的認識方式，反而顯得保守，新的思路不但不追求開發，還努力投資一種免遭開發的機制，故不開發不是貧窮的原因，而是富裕的基礎；避免開發的心態也不再是貧窮的病因，反而成為致富的機緣所在。比如湘西永順推廣沼氣工程，利用家家戶戶養豬的生產習慣，集豬糞為沼氣能源，成為再生利用的一種範式，同時藉由沼氣池所產生的二氧化碳，為永順大力推廣的柑橘建立保鮮室，並以豬糞灌施蔬菜為有機食品，開發週末摘蔬之類的農家樂休閒旅遊，供城市居民假日前來蔬菜林栽植或民宿。

值得探討的是生態扶貧的深化機緣，以及生態扶貧對於貧困村能動能力的提升效果如何。關於扶貧研究的文獻，以官方宣傳居多^①，而具體探討生態扶貧的文獻更是幾近於零，但在大的政治氣候中，胡錦濤就職國家主席與黨的總書記後，扶貧奔小康乃是最受重視的工作之一^②，倘若經驗已經顯示貧困村返貧是制約整體發展的因素，則貧困村脫貧的能動意識似應為中央扶貧政策的要點。生態扶貧將貧困村所在的生態條件凸出到最前緣，對於將貧困村放在某種主動地位有無促進作用，自是扶貧研究的主要課題。本文以下將以湘西土家族、苗族自治州的永順縣小溪（谿）鄉之生態扶貧為內容，探討生態扶貧的實踐在貧困村的菁英論述中，產生什麼樣的演化，從而反省生態扶貧這個概念，看小溪鄉是否因而蘊涵出了較豐富的能動潛能。

註① 中國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《反貧困研究》課題組，中國反貧困治理結構（北京：中國經濟出版社，1998年）；張力編，面對貧困：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的背景、現狀、對策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；中共湘西自治州委督察室、湘西自治州扶貧攻堅辦公室合編，攻堅壯歌（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6年）。

註② 汪莉娟，「政治局常會討論照顧弱勢族群」，聯合報，2002年12月13日，第13版。

二、小溪鄉的生態觀光構想

永順位於湘西自治州西北臨重慶，而小溪位於永順的東南，臨沅陵縣。鄉中心在酉水河畔，在經過重整歸併之後，目前轄有十九個行政村。湘西是西部大開發計畫最後一批納入的地區，永順還同時是國家級的貧困縣，而小溪更是永順的特貧地區。以十九個行政村論，小溪人口近八千，面積兩萬五千公頃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原始森林，覆蓋著六條成網狀分佈的主要溪流，包括洪溪、大明、魚泉、小溪、茶元、杉木等。湖南省率先在一九八二年成立小溪自然保護區，並在一九九七年利用鄉中心的幹部，在鄉政府另外掛牌成立一個小溪自然保護區管理處。二〇〇一年七月，在鄉民魯成貴的六年研究考察所得的基礎上，成功地申請成為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，湘西電視台特此製作了專題加以介紹。

小溪據稱是大陸中南十三省在第四紀冰川侵蝕後，唯一倖存的低海拔常綠闊葉原始次森林，受到中國科學院專家常年的關注，近年更成為歐洲植物森林專家重視的基因寶庫。依魯成貴的說明，小溪具有四大特色^③：

（一）唯一性：在世界上同緯度地區，僅有小溪這一塊原始次生林是屬於亞熱帶北緣山地常綠闊葉林區，為常綠落葉、闊葉混交林與針闊葉混交林所組成。由於綠蔭林蔽，小溪鄉中心的溫度低於永順縣城，平均氣溫 12℃ 到 14℃，而小溪原始森林中之溫度，可能最多低於鄉中心 6℃ 到 7℃，年降水量 1,300 到 1,600 毫米。屬於多雨型氣候，年相對溫度為 79%，同緯度不存在另一個熱帶林。

（二）多樣性：保護區植物區系統構成複雜，具有維管束植物兩百二十二科，九百七十四屬，兩千七百零二種，並且魯成貴還在不斷發現新樹種。另有脊椎動物兩百零八種，魯成貴透過糞便採集進行歸類，其中包含他沒有直接遭遇過的金錢豹。歐洲專家據轉述稱小溪為綠色基因庫。

（三）獨特性：保護區內的植物起源十分古老，保存了古老孑遺植物和稀珍植物，境內中國特有植物佔三十九種。從小溪採集命名的特有植物標本有二十一種，如湘西柯、樓梯草等。這一點是魯成貴最感到驕傲的。區內擁有七種國家一級保護植物—銀杏、水杉、珙桐、光葉珙桐、紅豆杉、南方紅豆杉、中華水蘊等，以及大量的國家二級保護植物。

（四）反常性：區內植物體現了各個不同氣候區植物相互滲透的特性，以亞熱帶的緯度，生長了十一種熱帶植物。

鄉政府的規劃是，應當把生態旅遊當成最主要的核心計畫，並準備依照國家自然保護區的管理辦法所規定，即核心地區不能居住，而希望將小溪居民中超過一千人遷村至毛坪鎮。可是這個遷村想法雖已經年累月，但至今因為收容村準備不妥，與近年

註③ 這四個特點，記載在小溪鄉長根據魯成貴的說明，所草擬的一份面向全國宣傳的草稿中（2003年8月30日）。

天災頻仍，造成上級政府財政負荷過重，故尚未付諸實施^④。而又依照國家自然保護區的管理規定，區內不得採取任何擴建。在既不能遷村，又不能擴建的矛盾裡，對小溪鄉幹部與居民們發展旅遊的想法，產生極大制約，以致遊客無自來水、無抽水馬桶、無洗澡浴室，甚至無充分賓館居住。二〇〇三年春通往小溪的公路甫完成，夏初即遭山洪摧毀，出入始終仰賴水路，但運接船極簡陋，無碼頭上下，港口泥爛。凡此種種，居民固然習以為常，遊客多難適應，故聞訊而來的雖日益增多，因並未發揮提供休憩的功能，只能吸引一次性的好奇之旅，達不到經常嚮往，隨時會來的效果^⑤。

三、小溪的兩種生態論述

保護生態似乎是世界政治經濟的新趨勢，在這個趨勢之下，小溪作為生態扶貧點的思路，可以說是順應潮流。然而，什麼是破壞生態的原兇，根據不同的生活經驗所得出的結果，可能是南轅北轍，則是什麼樣的活動與什麼樣的人會帶來生態破壞，就出現大家各自不同的判斷。因此，即使從國家幹部到地方領導都在談生態保護，但應該保護什麼現象，是什麼生態遭什麼人破壞，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對話。也就是參與生態扶貧論述的各方，對於旁人生活經驗迥然不同缺乏敏感，也就對於形成自身生態扶貧論述的各種條件所具備的相對性、特殊性或偶然性，難以採取反省的態度，造成各方圍繞生態扶貧概念而提出的因應，成為他人眼中可能是破壞生態的原因。這種不同論述位置間的差異，當然也就反映到各方對特定扶貧政策的評價。

生態保育意識是在現代化後期受到特別關注的議題，以發展為主軸的歷史進化觀點逐漸失去絕對性的地位，發展過程中許多本為提升生活品質與滿足消費慾望的產品，以及為了生產這些產品而建立的生產線、管理意識及生活價值都同時得到反省。對於低度開發的小溪鄉而言，並無實際的經驗基礎，體認在現代化進程後期的某些反思，當地現代生活消費意識萌生未久，正在起步，也很難依照旁人現代化的路徑再走一次。但當地各種超前的消費品如方便麵、可樂、卡拉 OK 卻都已經進入生活圈，只是用途不盡相同。比如方便麵並非為了忙碌工作的人簡食一餐而輸入，反而是給時間極為充裕的農民或幼兒，品食調味包中辛酸粉的刺激，在小溪當地人而言，象徵現代化的這些日常消費品，並不被認為帶有破壞生態的生活價值在其中。

小溪居民生活在原始森林之間，大自然是如此地具有包容與吸納的能力，他們很難想像個人之生活習慣有可能改變其萬一。他們就生活在自然之中，飲無自來水、浴無溫水，如廁無沖水，而這三點恰恰是前來旅遊的城市人抱怨最多的地方^⑥。小溪人洗澡就在自然溪河之中，成群結伴，男女分開時段，沒有具體規範，只有一般習俗，一躍而入，徜徉其間。在一段原始森林探險的經過中，導遊三度入溪水玩耍洗滌。當

註④ 永順縣財政局幹部訪談（2003年9月2日）。

註⑤ 永順縣副縣長訪談（2003年9月2日）。

註⑥ 當地店家訪談（2003年8月29日）。



地人排便在山林之中，吐痰進清澈見磊的溪潭之中，又洗衣洗碗而將清潔劑流入溪水之中。照城市人的現代化眼光觀之，這些無一不是污染環境之作。反而小溪人看見城市人疲勞不堪地自山林觀木歸來之際，居然不忘將飲空的礦泉水瓶自發地收好帶回丟棄，感到佩服，嘖嘖稱奇。反觀他們自己隨手棄置空瓶、筷子、塑料的包裝，從不認為有礙生態。

可見，這些現代化消費品超前來到小溪鄉之後，其用後之處置與排便、吐痰無異，在概念上都是回歸自然，村民在人人排便吐痰的溪中洗浴，毫無顧忌，因為如此龐大的自然界威力，早就將這些微渺的動作化解於無形，世代都沐浴在清澈的瀑布溪潭之中，飲於此、棄於此，方便麵的塑料包裝飄（漂）往何處，根本是滄海一粟，無關痛癢。城市人的大驚小怪，讓他們對城市人的衛生習慣很敬重，努力清掃房間，確實民宿也都很整齊清潔，但是他們卻興不起充分強烈的動機，來解決在他們看來完全不花精神的浴廁問題。所以他們花了再多的時間，城市人還是覺得他們不衛生，擔心他們丟棄塑料、洗滌劑會破壞生態。在這樣的視野下，國家政策要他們遷村以保生態之完全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上級所動員的生態管理模式，儘管是以反思現代化的生態浩劫為起點，但仍然不脫現代化的基本思維，其中尤其是以對現代科技的信任為明顯，而以自己居於文明領先地位的信心與眼光為依據。既然生態保育的目的是扶貧，則上級的著眼點就在於如何平衡觀光收益與生態利用。在政策上，首先就是要求退耕還林，這項政策普受歡迎，因為獲得青睞而得以參與其事的山坡地農民，退耕之後獲得國家財政補貼與糧食供應，同時每植樹一株便可得貨幣酬勞若干。然而，這個政策的邏輯本身，卻讓原始森林中久居的村民不能理解，因為他們世代狩獵，並不會滅絕任何物種，即使禁砍禁伐的政策讓他們失去收益這一點，並不造成抗議，因為人們獲得充分補償，但是自家必須進行房屋維修改建，老人過世必須製造棺材，一併在禁止之列，這就令村民難以捉摸，到底國家推動的是什麼意義的生態扶貧。

尤有甚者，因應生態扶貧概念而建造的觀光旅遊設施，照說是符合國家政策的，上級也透過政策融資購置運輸遊客的超狹形面的三輪機踏車，卻不准村民擴建民宿規模。因為，擴建或維修都必須用到建材，原本回身一砍就有，卻因為封山育林的政策，眼睜睜地看著週末假期湧入的遊客，無法擴大接待，痛失創造收益的機會。所謂村民砍樹建屋會破壞生態的擔憂，在小溪的微觀視野中體會不到，這與早年砍伐販售林木，是屬於截然不同的利用，但在上級的宏觀視野中不能照顧這種特殊立場。在國家的政策視野裡，任何一個准伐的口子被打開，其它的例外將接踵而至，造成封山政策名存實亡。這種執行的考量，脫離村民對生態扶貧的理解甚多。

另一方面，由上而下，由外而內的生態措施，卻將鋼筋水泥帶進了原始森林。上級特別安排以國債補助小溪，從外面請了專門的工作隊，依照村中生態專家的指導，開始鋪設步道。有的步道是水泥階梯，有的因為需要沿走山壁，跨越峭谷或登臨瀑布，而採用鐵梯鐵道。鋼筋水泥已經成為都市自然生活的一部份，城市人自嬰兒出生起就生活在鋼筋水泥之中，無視於鋼筋水泥與自然生態的格格不入，反而可以靠鋼筋水泥

產生安全感與熟悉感，在充滿陌生的原始森林中，鋼筋水泥保障了城市人親切的控制感。魯成貴曾建議用枯乾的禿木為梯材，但設計師認為城市人會誤以為是爛木材不敢踩，則顯然生態並非設計師的思維起點，甚至還將城市人那種受到原始森林某種威脅的假想，視為是理所當然。

如果說，小溪人將現代食品與飲料的塑料包裝，當成是生態的一部份棄置山林是一種污染，那麼將鋼筋水泥大量地移入原始森林，豈不成為超級污染？小溪人自幼在山林溪谷的岩塊樹藤之間往返自如，面對現代人認為岩塊不能作為台階，樹幹樹枝不能作為扶手的觀點，普遍帶有懷疑不解。魯成貴本人曾經建議，在河道中以堆排石塊為步道，沿山登爬則以泥巴階梯為主，即使受雨水沖刷，恢復並不困難，充其量可以在某些特別地方打上梅花樁，但絕不推薦帶入鋼筋水泥的做法。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，他表示將在未來繼續開發各種旅遊步道時，反對鋼筋水泥。一位民宿旅店的主人就形容這些鋼筋水泥為「大壞蛋」。一位小學教師還懷疑，某些地方階梯太多餘，恐怕是要賺取水泥工程款的故意浪費所致。

四、封山與遷村——能動性的隱讓

根據法律規定，國家自然保護區核心地帶不得居住，在小溪成為國家級的保護區之後，被視為威脅生態的人類必須依法遷出。在申請成為保護區升級的過程中，小溪居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，二〇〇一年升級成功，反而因福得禍。從扶貧的歷史經驗觀之，遷村已經不是什麼特殊的事，雖然遷村需要大量的說服與準備工作，但成功的案例不少，三峽大壩所涉及的遷徙工作規模之大，更是史無前例，因此國家設想的保護區遷村，在用到小溪時毫不稀奇。然而，小溪居民在二〇〇一年之前從未想到遷村會成為如此真實。一九九九年小溪成為省級保護區之後，遷村就成為一個話題，永順縣領導甚至曾經設定二〇〇二年為遷村的時點，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具體的行動。

鄉領導意識到遷村是法律規定，但是因為上級沒有提供充分的協調支持，使朱鄉長對於遷村的構思流於空想。遷村不能落實造成鄉長在施政上的困擾。在遷村的前提之下，他理所當然可以要求村民嚴格執行封山育林，然而牽延時日的結果，使封山政策顯得極不合理。村民自行砍伐擴建的愈來愈多，縣級領導堅定不准，要求鄉長執行拆除，但實在難以執行，如此逐步改建的已有三十多家，訪談過程中觸目可見，而積極準備擴建的，在訪談時尚有二十多家。夾在鄉民與縣領導之間的鄉長，自喻為柴火，意為衝突的引爆點。在遷村沒有實現的情況下，也有村民為了能參與旅遊觀光事業，而要求從山裡遷到鄉中心所在，可見「鄉—民」關係非常難以處理，而鄉長似乎沒有能力完成任何一項鄉民的要求。

鄉長的想法是，依村民的生活型態加以區別成三類，凡是以農耕為主的大部分村民，遷村之後繼續分配農田；以文化產業為生活內容的村民素質相對較高，應當組織成文化管理公司，擔任售票、收票以及森林警察的工作；原來從事旅遊業的小比例村民，繼續從事原業。至於目前可以增加收益的辦法，鄉長看準了養蜂業，因為經驗顯

示，蜂王漿受到來訪遊客中尤其女性與老人的歡迎。不過，上級對於投入養蜂沒有任何行動，鄉長感到在請求支持發展養蜂的問題上，縣領導的態度是不支持、不反對、不認識。長期貧困的結果，鄉民出外打工頗多，但與其它打工者不同的是，小溪農民文化素質低，打工的目的不是賺錢返鄉造房子，最多只能擔任體力勞動者，勉強在外養活自己，但一家之中若有兩人出外打工，起碼剩下的人可以在有限的農業生產條件下存活。遷村之後若能為農民買足田地，或可解決問題，然而除了上級的遷村規劃不下來，遷村目標所在的幾個鄉也表現被動。

在與主要的目標鄉毛坪洽商時，毛坪同意每戶可以建一棟四層樓，而且撥地有限，對於大戶人家容納不足，何況還有機關單位要用地，這就使遷村規劃更困難，上級迄今沒有積極介入協調。許多村民根本反對遷村，一位在原始林中開飲食店的村民表示，山裡比較涼快，而且人頭熟，出了村之後的生意非常難做。她在為一位台灣女婿受到當地村長不平等待遇而打抱不平時，稱這位村長待人的方式違反了居住自由，由於當時討論的是遷村，居住自由這個概念剛好與強迫遷村的規定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她並支持這位台灣女婿打官司，她同時也對鄉長的遷村構想抱持十分負面的態度。

為了生態扶貧而設想遷村，使得鄉長的整個施政受到羈絆，因而對於鄉政的觀感充滿被動與無力感。他對自己的職務調動沒有控制感，不知為何而來，也不知何時會調走。面對生態保育，他對於縣級的缺乏支持無以為力，總覺得不受重視。自二〇〇二年起退耕造林的財政補助沒有到位，原本歐盟的補助也還未落實到鄉，他自己的行政津貼，不夠他到縣城開一次月會的交通費，而一個月有時開會不只一次，故等於全無行政經費。省與國家先後將小溪鄉劃進生態保護區之後，縣領導至今沒有成立管理局，相較於其它地方雖未能申請獲准，卻先成立生態管理局，鄉長認為這個反差太大。他不能帶領鄉民投入接待源源而來的遊客，卻陷在紙上談兵的遷村計畫，感到鄉民並沒有脫貧致富的前景。

鄉民太窮，他們沒錢看醫生，以物易物，使得一些醫生改行從事旅遊業賺錢，不堪病人除欠不還的拖累^⑦。小學生繳不起學費，上交土、特產，由老師拿去賣了來抵學費。在小溪成為旅遊之地後，窮的鄉民便改抓毒蛇，毒蛇價值雖高，但也有人因此被咬而殘廢。真正能從旅遊業中受益的大約只佔鄉民的百分之一，而鄉政府本身也受困於封山政策，蓋砍柴收入的財稅所得原為鄉財政的最大來源，封山之後嚴重短缺，只能仰賴上級以財政預算支出來補貼。可以說，遊客雖然為鄉民帶來希望，不過至今不能有效提升全鄉收益，造成鄉領導某種相對剝奪的意識。過去曾經來鄉扶貧的外地單位實力有限，只能搭建一些小型便道，不能解決用水問題，更不能處理因為封山與保護區政策帶來的制約。

基於他自己不了解的原因，朱鄉長在受訪時表示，他受邀即將參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項會議，他必須準備書面資料。他寫了一份大約五百字的宣傳文字，文中邀請各界來小溪投資，但沒有說明現在的小溪鄉，是不可以進行建設的，他也從沒

註⑦ 當地店家訪談（2003年8月30日）。

有想到要說明。他過去的經驗引導他作官樣文章，過去他擔任鄉財政幹部，實事求是地上報人均收入，曾經被上級批回，要求他按照上級事前分派的數字申報。這次北京會議的性質他並不清楚，原本沒有抱持很大希望。但在訪談中對話各方一起商量之後，認為他可以利用這次大會將小溪遭遇的實際問題具體提出去，引起更高上級的重視，或許可以促成湘西自治州或永順縣政府採取更有效率的行動，早日就遷村之事積極進行規劃，解決懸而不決的問題。

對遷村問題有意見的，也包括從事旅遊業的老闆。一位從衛生局自願退職的年輕的李老闆就自有想法，他認為遷村不符合生態保育觀點，當地一位生態專家也如是觀。認為居民在原始森林過原始生活，本就是生態的一部份，就算是他們「啃東西的方式」，都是本地的生態特色，不應該人為加以變造。李老闆同意在生態區不適合再有人種田地，面對多數村民愈來愈窮，他主張將村民集中起來從事三項旅遊相關工作：接待遊客、清理森林區的垃圾、發展土家族的民俗表演。不過李老闆只與遊客談他的理想，因為他是小老百姓，「不好跟政府講。」而且，他認為種糧種稻也許不適合，起碼應該發展蔬菜種植。山上蔬菜奇缺，訪客在小溪停留期間，一共吃過蔬菜種類不超過五樣。另外，遷村要考慮之後祖祖輩輩的生存能力，不然搬出去之後不久自己又會遷回來，即使一位支持黨的老村民也說，搬來搬去，誰也管不了^⑧。

五、祖先與名份——能動性的流現

生態扶貧的提出帶來了新的可能性，即或可將貧困村民從政策的對象，轉變成為一個行動的主體。原本扶貧的要旨是，扶助貧困村開發經濟項目，提高收益。在國家的扶貧政策思維中，貧困村的自然生態只是政策工具，村民的既有意識與生活方式都不是扶貧政策所參考的依據，村民進入到以提高經濟為收入的現代化論述之後，也不認為自己當前的生活方式之中，存有任何值得扶貧政策採納的優勢。簡言之，扶貧政策雖然旨在協助村民開發，但是卻將村民放置在一個接受動員的被動位置，村民倘若不能遵循政策指導，逐步從貧困脫離，則自身就不存在任何可以受到尊敬的特質，並進一步在身份與文化構成上遭到貶抑，從而更加打擊村民面對外界或上級時的自信心，並因此強化了從國家政治經濟體制中疏離的趨勢。生態的概念加入了扶貧的政策論述中之後，在小溪已經注入了若干主體能動能力，雖然這不是國家扶貧政策或生態政策的重點，卻將影響到村民爾後的身份意識。

小溪鄉村民生活在小溪原始生態林之中，生態成為論述的中心之後，住在生態區之內的人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對當地生態的詮釋過程。村民的固有生活方式乃是他們發言的基礎，他們的生活經驗，已經提供了充分的關於當地生態的知識，儘管這種知識的獲取與表述與專家們的學術系統不一致，但卻因為熟悉性與在地性，村民們理所當然覺得自己可以主張發言權。小溪生態林在得到省與國家兩級的相繼保護之後，

註⑧ 老村民訪談（2003年8月31日）。

小溪鄉村民就產生了一種被認可的感覺，這種感覺是村民面對外界與上級時進行對話的重要根據，由於源自於日常生活，因此往往理直氣壯。

小溪鄉村民在心態上抗拒搬遷，當然是基於他們世代以來與小溪原始林一體生活的生命歷史，許多人對於村民如何做好生態保護提出自己的看法，這在其他地方相對單純的扶貧政策中，是不可想像的。因為，扶貧政策在概念上就已經排除了貧困村民的發言權。所以，小溪鄉民進行關於自己參與生態保護的任何自我想像，即使只是在私人範圍內流傳，卻標誌出一種主體意識的萌發現象。人們藉由生態這個概念的引入與再利用，找到了自己發言的位置，在生態保護的論述之下，小溪村民不是用貧困可以鎖定的對象，他們徜徉在林海溪流之中的豐富經驗，使他們不再只是扶貧的對象，而是面對外人講述經驗的主體。這些外人可能是好奇無知的遊客、中國科學院的專家或歐美的生態環保人士。他們必須靠當地人的引領、開路與說明，來滿足自己的探索需求，而提供外人足以滿足需求的村民們，在姿態上就從一個待援的弱者，成為指引的導航者。

村民們也為美國一批登山者帶隊，對於他們的環保意識留下深刻印象，來客能夠將吃的殘餘物全部帶回處置，他們個個穿戴全副登山設備，人高腳長，在平地上走的比村民還快。不過，到了山裡就不一樣。一般村民即使進山，腳上穿的也不過就是家居時的一雙薄底塑料拖鞋，腳趾、腳背、腳跟全部暴露在空氣中，但卻能健步如飛，在與外國人的比較之中，充滿自信，至於一般城市人就更不用說了。筆者某次在暗夜中失足滑落溪中，一位村民迅速地躍入撈住皮帶自腰部從後提起，以免筆者在溪中再度打滑沈下，並利用微弱的手電筒，找到滑落後漂在潭面的拖鞋，他要筆者踩住他的腳，就不會再滑倒，之後步步回到岸上。這些一批批來到小溪探訪生態的客人，讓村民意識到自己在原始森林中的生活能力，這種能力不是扶貧論述中的落後文化象徵，而是生態論述中的文化資源。

在一次原始森林之旅中與權充嚮導的魯成貴提到，日昨訪客曾觀看水蛇在溪中覓食，魯成貴則讓訪客放心，因為他當日在進入森林之前，已經把蛇都控制住了！他的辦法是，先點一根煙，然後唸誦咒語，把蛇趕跑，等要離開時會再把牠們放出來。他認為幾年來他奔走山林，為了讓小溪成為生態保護區而蒐集數千種動植物的標本與糞便，如果不是靠著咒語控制蛇，他早就被毒蛇咬死了。但這個咒語是不能任意學的，乃從祖先家傳一脈而來，所以只有他才會唸。有的村民遇到從未有人跡的這類原始林也不敢進入，不過魯成貴卻可以讓他們放心一起探幽訪勝。

生態論述與祖先論述的結合充滿各種潛在的發展可能。多少年來，山中因為雨水沖刷或電擊，常有千年巨木倒下，但村民不敢使用這些巨木，因為這些巨木是看著村民的祖先世代繁衍下來的見證。有的巨木倒下後繼續生長，有的則是在木上再發新芽，另成樹上有樹的奇景。祖先意識原在現代國家體制下是無法表達的，甚至還是國家體制視為封建待解放的公民文化障礙，如今生態扶貧的推動，間接地開闢了小溪地方祖先意識得以表述的空間，則國家希望擁有生態保護區的法律立場，就益加顯得是一種外來的介入姿態，祖先意識促成了生態論述中的主體感，與國家動員形成某種

對比。

這種對比具有一種矛盾性，一方面出現對國家計畫搬遷村民的逆反態度，但另一方面，又自願依附在國家對小溪生態區的認可之中。在這個逆反與渴望認可矛盾之中，國家給小溪命名為保護區的能力似乎居於主動，而村民的主體意識則仍然是一種具有創意的意外回應。命名的政治對小溪村民追求身份認同產生了吸引力，在申請成立國家級保護區的過程裡，許多在小溪形成叢集的特殊樹群，均必須以外地名稱命名，因為依慣例樹種是以最初發現地來命名，即使這些罕見樹種在小溪較多較密。惋嘆之餘，卻也還能在小溪發現最新的樹種，故這時當然以小溪有關地名命名之，除了前述湘西柯與永順樓梯草之外，另如永順稅米薺、永順鐵線蕨、湘西石櫟等皆是。魯成貴感到從此小溪就有名份了，因為當其它地方日後發現同類樹種，就會在那裡出現小溪的名稱，就像如今小溪原始林中會出現紐西蘭或台灣的名稱。

魯成貴的願望是能得到國家兩萬元人民幣的資助，這樣他就可以拍下兩千多種植物與七百多種昆蟲的照片。他每年還在發掘新的科種，送到中科院去鑑定，故他對自己不能識英文與拉丁文頗感遺憾，否則他就可以自己造冊了。在他看來，植物學的博士來到小溪也必須和他學三年，因為他識得兩千種以上，而一般博士生也不過知道一千種。他設法動員中央台的記者來報導小溪，但是目前仍爭取不到任務項目，沒有任務項目支援的話，對中央台而言就是廣告，則費用驚人。在以生態保護為內容的扶貧政策中，扶貧對象雖然只有七百元的月薪，但一點不貧窮，他們對於國家與上級指指點點，對外人充滿自信，對祖先懷抱崇敬，活在國家熟稔的扶貧論述範圍之外。

六、結 論

湘西生態扶貧與一般扶貧政策相比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在提升村民收入的效果上未必特別凸出，但是在賦予村民某種主體能動意識方面，則有更積極的作用。生態是一種具有在地性的論述，在地村民站在生態的基礎上，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，對國家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^⑨。像小溪鄉居民就對遷村有著許多想法，雖然國家幹部不一定聽得到他們的主張，但是村民具備不同於國家的視角，且能有所自信地形成一套看法，說明生態意識不是國家幹部能夠片面封鎖的一套動員工具，而是備受競爭的一個觀念場域。國家在生態論述中發展出來的遷村政策，反而是與生態論述不全一致的產物。固然在表面上，為了保護生態而遷徙，似乎是對生態的尊重，但深層裡卻因為抵觸了村民對自己在生態中的定位，造成村民主體意識中所萌生的某種抗拒力量。

恰巧由於遷村的執行遲緩，意外凸出了村民的生態保護與國家的生態保護重點不同，畢竟村民不會相信自己世代居住的原始森林，要因為自己繼續生活在此而遭破壞。而為了脫貧，他們之中便有人積極擴建，以吸納更多的遊客，忤逆了封山政策，也就

註⑨ 湯京平、呂嘉泓，「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—從山美與里佳經驗談社區自治與『共享性資源』的管理」，
人文社會科學集刊，第14卷第2期（2002年），頁1~28。

將小溪鄉的主體性反襯出來。中央與地方對於在地資源的運用有爭議，在各地皆然，小溪鄉並非特例，但小溪鄉民並不只是停留在經濟效益的邏輯上與國家週旋，而是更有內容也更有主體意識地主張生態保護，生態扶貧的概念讓他們超越貧困村的自我理解，則他們的抗爭就不是單純的反抗國家政策，甚至不必衍生濃烈的抗爭意識，因為他的主體性不全來自國家，而更奠基在他們熟悉的、融入的，且國家已經認可的他們世代生活的環境上。

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，村民一旦進入了現代化與扶貧的概念之後，自己也在為營利而興建民宿樓，於是就從論述的基礎上，承認了自己的落後。祖先論述的出現可以說是一個轉折，讓村民回到屬於在地的某種生態意識中面對國家。這樣的在地論述與國家現代化論述共同在幹部與村民身上出現，形成不可捉摸的身分實踐。他們既是立足於現代性的角度裡追求脫貧致富，又是立足於在地身分中質疑國家，雖然看起來並不一致，卻意外地揭露了國家的矛盾性，讓國家在規訓他們的同時，也表現成對生態的介入與對生態的關注兩樣立場。則生態扶貧之所以為生態，就不能理所當然認為有什麼固定的內容了。

*

*

*

Cement and Excrement: Agency for Self-empowerment in Western Hunan's Poverty Discourse

Chih-yu Shih

Abstract

The introduction of an ecology discourse to the state's anti-poverty campaign has provid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Western Hunanese to execute indigenous agency in the state-monopolized policy arena. This new discourse gives the local villagers a sense of agency in interpreting what it means to be ecological protection. Two ecological views emerge accordingly: one considers villagers as potential threat to ecology, and the other views modernity as the threat. This paper reports on unfamiliar views from a research trip conducted in a Western Hunan mountain site. It attends particularly to the opening up of poverty discourse to allow the re-representation of previously unheard identities and accommodate possibilities not considered in the past.

Keywords: Ecological protection; anti-poverty; Western Hunan; agency; modernity



參考文獻

- 中共湘西自治州委督察室、湘西自治州扶貧攻堅辦公室合編，**攻堅壯歌**（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6年）。
- 中共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《反貧困研究》課題組，**中國反貧困治理結構**（北京：中國經濟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- 張力編，**面對貧困：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的背景・現狀・對策**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- 湯京平、呂嘉泓，「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—從山美與里佳經驗談社區自治與『共享性資源』的管理」，**人文社會科學集刊**，第14卷第2期（2002年），頁1~28。

